

爱因斯坦全集

第八卷 柏林时期 上 (1914—19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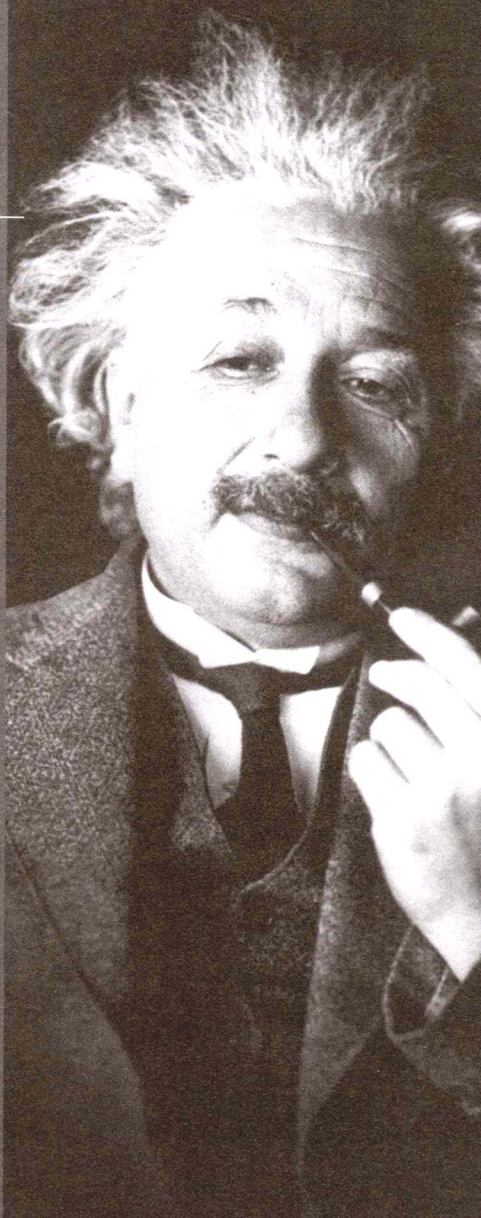
Robert Schulmann, A. J. Kox, Michel Janssen,
and József Illy/主编

杨武能 / 主译 邹振隆 / 审校

[美] 阿耳伯特·爱因斯坦 / 著 K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Volume 8 · Part A: The Berlin Years: Correspondence,
1914—1917



爱因斯坦全集

第八卷^上
柏林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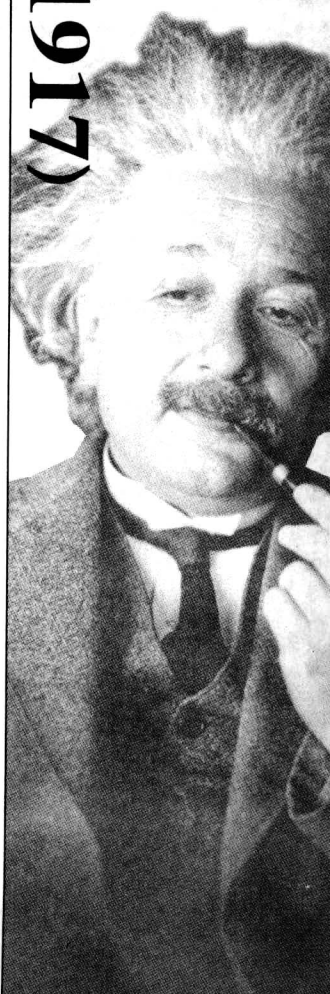
(1914—1917)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美] 阿耳伯特·爱因斯坦 / 著 K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Robert Schulmann, A. J. Kox, Michel Janssen,
and József Illy / 主编

杨武能 / 主译 邹振隆 / 审校 徐纪贵 / 译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VOLUME 8

THE BERLIN YEARS:
CORRESPONDENCE, 1914–19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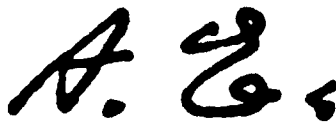
PART A: 1914–1917

Robert Schulmann, A.J. Kox,
Michel Janssen, and József Illy
EDITORS

Karl von Meyenn
ASSOCIATE EDITOR

Guillaume de Syon and Giuseppe Castagnetti
CONTRIBUTING EDITORS

R. Fountain, A. Hentschel, A. Mynttinen, and A. Pringle
EDITORIAL ASSISTAN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Volume 8: The Berlin Years: Correspondence, 1914—1918

Copyright © 1998 by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Hardback copyright © 2009 by Hunan Science & Technolog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通过美国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获得本书中文简体版全球出版发行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03-13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因斯坦全集. 第八卷 / (美) 爱因斯坦 (Einstein, A.)
著; 杨武能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357-5789-0

I. 爱… II. ①爱…②杨… III. 爱因斯坦, A. (1879~1955) —全集 IV. Z4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4937 号

爱因斯坦全集

第八卷 上 柏林时期 (1914—1917)

著 者: [美] 阿耳伯特·爱因斯坦

主 编: Robert Schulmann, A. J. Kox, Michel Janssen, and József Illy

主 译: 杨武能

审 校: 邹振隆

策划编辑: 李永平

责任编辑: 徐 为

文字编辑: 陈一心 胡捷晖 肖和国

出版发行: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 长沙市湘雅路 276 号

<http://www.hnstp.com>

邮购联系: 本社直销科 0731-84375808

印 刷: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厂联系)

厂 址: 长沙市青园路 4 号

邮 编: 410004

出版日期: 200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1.75

字 数: 749000

书 号: ISBN 978-7-5357-5789-0

上下册定价: 330.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谨以此卷纪念

Marc Besso

(1922—1995)

主办者

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
和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编辑顾问委员会

Peter G. Bergmann	Itamar Pitowsky
Aryeh Dvoretzky	Nathan Rotenstreich
Freeman J. Dyson	John A. Wheeler
Gerald Holton	Harry Woolf
Walter Hunziker	Reuven Yaron

编辑委员会

Mara Beller	Abraham Pais
Robert S. Cohen	Gideon Rakavy
Gerald Holton	Fritz Stern

资助者

《爱因斯坦全集》(原书)之得以付梓,端赖下列资助者对编辑工作的慷慨资助,现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以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谨对他们表示感谢。

捐赠者

Harold W. McGraw, Jr

资助机构

波士顿大学(美国)

瑞士联邦技术大学(苏黎世,瑞士)

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美国)

Alfred P. Sloan 基金会(美国)

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

Dr. Tomalla 基金会(瓦杜兹,列支敦士登公国)

Pieter Zeeman 基金会(荷兰)

太阳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美国)

个人资助

Jan Philipp Reemtsma

中文版出版说明

阿耳伯特·爱因斯坦不仅是 20 世纪最杰出的物理学家,而且是一位富有哲学探索精神的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对他的科学成就、科学思想、政治言论及生平的深入研究,势必成为科学史界普遍关注的话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自 1987 年出版《爱因斯坦全集》(*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第一卷以来,已陆续出版多卷,随着资料不断地收集,全集出齐将超过 25 卷。

全集不仅包括爱因斯坦的全部学术论文,还涉及有关和平、宗教、犹太人问题等社会政治言论,还有他与家人及朋友的往来书信,各种听课、备课笔记以及其他有关他个人的全部材料。这些材料是目前研究爱因斯坦最权威、最全面的资料。其中许多材料是首次公开发表。《爱因斯坦全集》的编辑出版,是国际科学史界的一项大工程,它不仅可以填补科学史上的一些空白,而且可以澄清一些广为流传的讹误,其学术价值和文化积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我社聘请国内科学史界和物理学界资深专家教授及年轻学者翻译出版《爱因斯坦全集》,这对我国学术界来说无疑是一件幸事。读者将最大限度地追踪爱因斯坦的思想、生活及科学活动,从中领略到科学和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深远影响。

《爱因斯坦全集》中文版是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德文版精装本翻译的,翻译过程中还参阅了此书的英文版平装本。为了便于前后各卷的统一,全集中除爱因斯坦外的人名均未译。地名及专有名词在正文中第一次出现时附注了原文。各卷的边码均指示德文原版书的页码,以利读者核对原文。全集各卷注释及索引中的页码除特别指明外,均指德文原版书页码即中文版的边码。中文版将原版索引拆分为三,一是名词索引,

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名称、地名和地址以及科学技术词汇。以人名命名的科技术语也在其中。二是人名索引。此外尚有引文索引。名词索引按汉语拼音顺序排,人名索引及引文索引按拉丁文字母顺序排。

《爱因斯坦全集》的翻译出版工作浩大而繁杂,这使得我们的工作难免留下某些遗憾。恳请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和出版界的朋友、同仁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利改进工作,促使此项翻译出版工程圆满完成。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年5月

I

1914年,阿耳伯特·爱因斯坦定居德国的首都时,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仅仅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此时他自嘲地认为,自己被招聘到柏林,仿佛是被当做一个“各方争抢的下蛋母鸡”——而这“母鸡”却担心自己再也下不出蛋来了。^[1]但到本卷结束之时,他却以一个关于引力作用的重大新理论取得了自己的智力成就,几乎赢得了家喻户晓的声誉。1914年春季,当爱因斯坦就任普鲁士科学院院士时,他在专业领域和私人圈子里的孤立和孤独似乎都已经结束了。然而本卷所发表的这些书信的明显特点之一却表明了,在喧闹的柏林,犹如当年在瑞士时那样,爱因斯坦依旧是孤独地埋头研究并取得了成功,从而被推入国际物理学界众人瞩目的中心。在私事方面,他是按照本能的需要行事,为使工作不受干扰,他一到柏林便将妻子和孩子们撵出柏林。为了实现自己在科学方面的雄心壮志,他欣然放弃了自己的种种次要的目标,同样,他也需要远离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也就是说,在整个战争年代,他自始至终都对公众事务抱着忽冷忽热、踌躇不决的态度。

尽管欧洲的知识界对他越来越赏识,并且柏林的社交界要求占用他的时间,爱因斯坦也坚持不放弃自己一心一意追求的科学抱负,为此他是付出了代价的。与他1917年秋季担任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之后学会摆脱向自己提出的大量没来由的要求一样,他在与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和家庭的小圈子的交往中,也采取了某种冷漠无情的态度。与之类似,在本卷所涉及的那个时期正在进行的涉及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的争论中,他也准备放弃与他的地位相符的立场。狂热地投入自己

的工作,是他不变的态度。

爱因斯坦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坚定性,无异于给本卷编者的肩头加上了一副责任的重担。在挑选书信交往的对象时,他是有所偏爱的,为了和他的偏爱相配,我们采取在所提供的资料中慎重挑选的方法。我们想将注意力集中于在专业领域和私人事务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那一批信件上,因而可以勾画出 1914—1918 年期间爱因斯坦的天地之轮廓。即使采取这种方法,结果本卷正文中还是囊括了编者所知道的在柏林的头几年里爱因斯坦所写的或者他所收到的总计 820 多封
xxxviii 往来书信中的 677 封。^[2]对于那些想了解全部往来书信的读者,我们将那些没有编进正文的书信的内容简介编进了本卷正文之后的年表和日志中。在正文中发表的书信里,有大约 30% 不在编辑工作的范围内,或者仅仅以不完整原件的形式保存在犹太人国家与大学图书馆的 A·爱因斯坦档案室里。

II

在爱因斯坦确保以实验的方法对其日渐脱颖而出的广义相对论进行验证的努力中,他持续不断地以大量的精力投入自己的研究工作,这种表现得十分具体的持续性,犹如一条线索贯穿于本卷的始终。早在 1911 年,当爱因斯坦还在布拉格当物理学教授时,天文学家 Erwin Freundlich 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参见本书第五卷,文件 281)。到了 1913 年底,爱因斯坦对 Freundlich 的兴趣更大了,但这远不是对后者的发展前途或者独立的研究兴趣的偶然关心,而是由于 Freundlich 将会成为他的弟子。还在苏黎世的时候,他便写信告诉 Freundlich,他不久前刚被选进普鲁士科学院,如果该院拒绝筹集可供使用的资金,他愿意自己掏腰包支付研究经费(参见本书第五卷,文件 492)。大约与此同时,也就是在爱因斯坦初次到柏林登台亮相之前,他对许诺给他的一个新建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的所长头衔——这是在商量过程中对方亮出的吸引他到柏林去的最有效用的一张牌——怀着很大的希望,希望这能成为事实。不管受托兴建这个研究所的委员会有何意图,^[3]反正爱因斯坦已经为该研究所重新谋划了更为缜密的计

划,其唯一目的就是为 Freundlich 营造一个安身之处,使他能够在那里专心致志地进行爱因斯坦始终放在心上的验证广义相对论的实验工作,同时又不必因经费问题而发愁。在柏林岁月里,爱因斯坦以辛勤工作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追求这个目标便证明了这一点。直到 1917 年 10 月,由于创建研究所的计划被搁置下来而愿望落空,^[4]爱因斯坦才灵机一动,设法为 Freundlich 另外寻找一个进行研究工作的场所。在写给波茨坦郊外的新巴贝尔斯贝格天文台 Freundlich 的上司的一封信呼吁书里,爱因斯坦请求将这位天文学家从日常的天文观测工作中解脱出来,而那位上司 Hermann Struve 台长对这个请求却予以断然拒绝。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爱因斯坦的书信中多处流露出他谋求获得普鲁士政府高级官员^[5]和他的同道 Max Planck 与 David Hilbert 的支持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意图。爱因斯坦反复地恳求,为他的弟子到另一家天文台谋求一个研究工作职位,想方设法帮助他满足获得教师职位的要求,最后甚至打算直接为他安排一个学术职务,与此同时始终规避 Struve 的同事 Hugo von Seeliger 的阴谋诡计。

所幸在 1917 年初,当爱因斯坦为 Freundlich 寻觅一个更大的科
研资助者的种种努力显然一一落空之后,一位名叫 Franz Stock 的柏林制造业巨头承诺给威廉皇帝学会提供一笔 50 万帝国马克的资金赠款的每年利息,用作一个物理研究所的运行费用。爱因斯坦马上凭这笔意外获得的赠款将 1917 年的春季和夏季时间都用于为创建这个颇有前景的机构按其规格编制详细计划。这个研究所将仅仅充当按其需要为研究服务的角色。

xxxix

1917 年 10 月份,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成立了,尽管它还仅仅存在于书面上。要为 Freundlich 支付年薪 6000 帝国马克,而且要作出安排,给他提供一个工作场所并允许他进入波茨坦的天体物理研究所的一个仪器实验室。爱因斯坦则在自己的住所遥控指导其业务工作,同时让 Ilse Einstein 承担助手性的秘书工作,每月付给她 50 帝国马克工资。

一个研究所通常的华贵外衣对爱因斯坦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对他而言,只有当这个专门的科研机构的实际结果与他自己的努力目标相适应时,才是有意义的。这种推测的证据就存在于爱因斯坦的研究

所在其运行的最初几年里所制定的给予补助的模式之中。在本卷所涵盖的这几年时间中,除了补助给 Freundlich 的钱,另外就只给 Peter Debey 发放过一笔与其在物理学界的地位相称的补助费,而这些钱从来都没有用光。

无论如何,如果猜测爱因斯坦在其行政管理的举措中存在着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那将是一个错误。正如他具有关注重点的能耐一样,爱因斯坦是一个节俭的人,然而读者总能从这些书信的字里行间感觉到,他在代表其他个人或机构——对其意图他抱着赞同的态度——与官僚们打交道时不无迎合巴结之嫌。在与 Wilhelm Wien 就德国物理学会的前途简短地交换意见时,在与苏黎世的官员和同行们就苏黎世大学的学术继任者(Alfred Kleiner 的继任者)方面的一个问题进行非正式商谈时,在动员关系很好的朋友们(Fritz Haber)帮助一名正在奋斗的年轻同事(Gunnar Nordström)时,以及在填补威廉皇帝研究所空缺的两个领导职位(Karl Schwarzschild 和 Friedrich Helmert)的问题上,爱因斯坦都表现出相当有策略的处理技巧。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他毅然决然地为以前的同事和朋友 Friedrich Adler 进行辩护,此人由于在 1916 年秋季暗杀奥地利总理而陷入被判处死刑的严重危险境地之中。爱因斯坦在柏林领导一场请愿活动,通过苏黎世物理学会呼吁赦免,他和 Adler 都曾经是该学会的成员。他思考的是,如何才能最好地利用奥地利法庭的同情心(见本卷文件 310 和 331),并且使他的苏黎世的朋友们切记赶紧行动的必要性。请求赦免的呼吁书于 1917 年 5 月起草好并递交到维也纳,然而奇怪的是,上面却没有爱因斯坦的签名。

xl

III

爱因斯坦的目的意识是促使他为其助手 Freundlich 提供一个可靠的机构与制度的基础的原动力,同时也对他的私人领域起到指导作用,尽管由于他处于紧张情绪之中而看不清终点何在。先前当爱因斯坦与 Mileva Marić 的婚姻的玫瑰花凋落之时,也就是在新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期间(如果不是更早一些时候),他便把自己的浪漫情趣转向

了自己的堂姐 Elsa Löwenthal Einstein。1914 年夏季,爱因斯坦刚刚在柏林定居下来,他便立即作出决定,一定要摆脱自己的妻子。在爱因斯坦的一份备忘录(即本卷文件 22)中有一个一览表,其中一一列举出他准备继续与 Mileva 和他们的两个年幼的儿子 Hans Albert 与 Eduard 共同生活下去的种种令人难受的前提条件。令爱因斯坦大为惊讶的是,Mileva 却因深知他的固执而接受了他提出的这些条件,并且最后她竟然动了恻隐之心,于 7 月底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柏林。在本卷的附录中,对这些分居的条件作了概略的介绍。尽管爱因斯坦起初对 Mileva 是以离婚作为威胁的手段,并答应娶当时生活在柏林的 Elsa 为妻,但他还是于 1914 年的夏天离开了柏林,一边心里思考着,究竟什么办法算得上是既不需要采取什么行动,又能使他享受到一种自我满足而又受到保护的生活方式,理想的解决办法:他从首任妻子那里争得自由,而同时却不会被迫与堂姐结婚,可是他仍能得到她对自己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无浪漫情调的爱人式的关怀。

不过,来自 Elsa 及其父母的压力^[6]却毫不松懈,于是爱因斯坦在 1916 年作了一次协同配合的努力,争取与 Mileva 离婚。不过当他听说她因此而精神崩溃,起初他推测,这是她装出来的,他便突然中断了进攻。但是到了 1918 年的年初,他患了一次严重的胃溃疡,致使他卧床不起,于是他断然决定再婚。他这样考虑是相当实事求是的,为了自己的后半生,他需要一个忠实的伴侣陪伴和照料自己,成为自己的健康支柱。一个事实突显出这个考虑问题的角度,那就是当爱因斯坦坚持想要再婚时,很惹人注意的是,他认为,不管是 Elsa 还是她的大女儿 Ilse 成为他的新妻子都是无关紧要的(见本卷文件 545)。然而 1916 年 10 月的一封信(即本卷文件 265)却无异于是对这种态度的一个不无讽刺意味的对照。在此信中,爱因斯坦怀着高度的道德义愤戏剧性地为由于一个男性邻居有意引诱而失身的一名女仆的贞操进行辩护。

不谈这种多少有些装腔作势的表现,显而易见的是,对妇女做出骑士风度是爱因斯坦的个人语汇里的一个组成部分。1916 年夏季,在关于更多地揭示这个话题的段落中的一段里,他向他最亲密的朋友 Michele Besso 指出,妇女都是些无助的人,除非男人们给予她们方向

感,否则,她们是绝对要垮掉的(见本卷文件 238)。一方面我们的确不想为爱因斯坦持有这种有偏见的看法作什么辩解,而同时却有必要记住,在具体的行文中,是暗含着这种普遍特征的。1915 年 11 月,爱因斯坦对广义相对论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研究,由于其工作强度之大是无与伦比的,他身体上和精神上都累得精疲力竭,因而确信 Mileva 假装重病是为了在离婚问题上欺骗他,于是他便轻率地对她痛加斥责。

涉及爱因斯坦生活中最私人的侧面(包括没完没了的为了家庭财务而发生的满腹怨恨的争执)的这些书信,其通信对象基本上就是已经提到过的那些主角: Mileva, Elsa 及其大儿子 Hans Albert, Besso, Besso 的妻子 Anna, 爱因斯坦的另一位可以信赖的苏黎世密友 Heinrich Zangger, 还有牵涉较少的他的妹妹 Maja 和母亲 Pauline。这些书信的调子常常是饱含怨恨之意而仅仅考虑个人的私利。除了 Mileva, 承受爱因斯坦所施加的硬心肠压力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在他出于绝望心情而写的许多书信中,其绝望的程度是不容低估的,这是可以依据 1918 年初期的事实来作出的判断,当时爱因斯坦走得如此之远,甚至对自己最好的朋友加以谴责,称他们同他交往时的所作所为是问心有愧的,其实这些朋友在很多时候都是出于对他的钟爱而甘愿放弃自己的清静生活和个人利益(见本卷文件 442)。爱因斯坦为自己创造出来的孤独所付出的感情代价,确实是高昂的。最后当本卷即将结束之时,爱因斯坦在与妻子的交锋中占了上风,离婚程序进入最后阶段。1919 年 2 月,下达了离婚判决书。

IV

关于爱因斯坦到柏林之前的政治信仰的传统观点,现在有时也受到置疑。因而,以他 1912 年末声称他是与塞尔维亚人站在一起的^[7]为例,他的这种立场很容易被理解为是起因于他在塞尔维亚与奥匈帝国对峙的形势下,与失败者一方是天生一致的。关于爱因斯坦与留在苏黎世的革命者有牵连和他在布拉格期间与犹太复国主义发展了密切关系的其他指责,则是建立在缺乏证据的基础上。反正本卷所收的

文件使人对一个长期流传的许多人所持有的由 Otto Nathan 和 Heinz Norden 提出的看法产生怀疑。这两位作者编辑出版的《爱因斯坦论和平》(1960)一书,勾画出一个登上柏林的政治舞台并已经做好了投入政治斗争准备的爱因斯坦。这种观点由于暗含着爱因斯坦在战争年代里自始至终毫不动摇地主张承担政治义务的意思而得到补充。因此在这一点上,弄清楚 1916 年初一名警官向柏林地区最高军事指挥部所递交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对他当时的评价是很重要的。在指出爱因斯坦订阅自由派报纸《柏林日报》并且是和平运动的一名追随者之后,该警官又说明,他在政治上尚无定见。^[8]

xlii

虽然爱因斯坦在其 17 周岁之前放弃[德国]符腾堡的公民权^[9]算不上是他的一个政治声明,但的确是三年之后免除服兵役义务的一个办法。确实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在爱因斯坦的瑞士年代里,政治事务对其个人小天地有什么冲击。不管怎么说,他随身带到柏林来的,无疑是对一切科研活动的国际性质的有力承诺。而正是这一点,胜过其他所有原因,促使他于 1914 年 10 月签署了《告欧洲人书》。一方面,爱因斯坦在比利时的中立受到侵犯之时出于本能的道德义愤而如此行动,另一方面,他对早些时候德国知识分子的宣言(《致文明世界的宣言》或称为《93 人宣言》)的抗议,是针对他所察觉的这些知识分子对其根本义务的背叛——他们的根本义务本应是:保持国际科学文化对话渠道的畅通无阻。尤其使他觉得这种背叛令人讨厌的是,与德国军队团结一致的宣言是从文化精英阵营发出来的——而他本人不久前才被招募进这个阵营。

并不令人惊奇的却是,在战争年代里,爱因斯坦参与政治事务是短暂而非系统性的。他一如既往地优先考虑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因此直到 1915 年夏季,也就是在战争爆发整整 10 个月之后,他才成为那个名为“新祖国”同盟的和平组织的成员,而他之所以加入其中,很可能是为了参加一个起草知识分子呼吁书的委员会,其实这项工作已告流产。第一次是其堂姐 Elsa 陪他出席该同盟的会议,然而她在爱因斯坦试探柏林的政治潮流深浅的活动中究竟有何进一步的作用尚不清楚。反正在这件事上,究竟有无某种暗示性的迹象能使人联想到她的影响作用,还需要进行探究。Elsa 和 Ilse 的亲密朋友、医生兼

和平主义者 Georg Nicolai——爱因斯坦前一年所签署的《告欧洲人书》正是他起草的——将德意志帝国政治活动的令人迷惑的阵容告诉他,究竟是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本卷文件 57、289、302—304 以及 541 中,存在着某些 Nicolai 意图对爱因斯坦施加影响的迹象。

可以肯定,当时似乎把这位参政新手搞糊涂了。因此爱因斯坦在普鲁士科学院会议上,就该不该剥夺那些与德国交战的国家的外籍通讯院士资格问题热烈交换意见的过程中依然保持沉默。很可能他是同意 Planck 和其他稳健派的提议,将这个问题搁置不议,待战争结束之后再说,不过事实却是,在会议纪要中并没有他的表态记录。

xliii

确确实实,爱因斯坦已经做好准备,打算在中立国荷兰的同行 H. A. Lorentz、Paul Ehrenfest 和柏林科学院的那些同事们之间进行调停,努力扭转被《93 人宣言》损害了的国际团结局面(见本卷文件 275、276 和 282),与此同时,他在战争开初几年的政治评论却又含有特别举棋不定的意味,好像他是在黑暗里摸索路径似的。他把自己的处境比做疯人院工作人员的处境,把著名的和平主义者 Romain Rolland 描绘成一个相信自己意图的“乐观主义者”。其意图是,通过参加一个争取持久和平的中央组织的行动,救治那些陷于癫狂而难以自拔的人(见本卷文件 73)。此后不久,他允许别人将自己的名字列入一个有关组织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名单(见本卷文件 131)。他为自己的知识产权被盗用于支持德国的沙文主义余孽而感到不快(见本卷文件 560),然而他也谴责莱顿的 Ehrenfest,因为他认为,Ehrenfest 拒绝接受 Hilbert 的邀请到战时的德国来出席会议,其象征意义是空洞无聊的(见本卷文件 503)。

爱因斯坦的此类观点和态度清楚表明,他是鄙视当时正席卷德国和其他欧洲交战国的空洞的爱国主义口号的,不过此类观点亦很难支持一种所谓他在柏林时期的头几年中就形成了始终如一的政治立场的看法。而在本卷中显得更为特别的是,他是怀着同情而又反感的混合心态隔着一段距离观察世界舞台上的风云突变,正如他在至少不止一次的场合下赶紧补充的那样,以一种使他心烦意乱而又几乎不一致的调子表态(见本卷文件 34 和 219)。

最初爱因斯坦除了与“新祖国”同盟、荷兰反战理事会及争取持久